

機會主義者：英國、美國、台灣與李光耀的 總理路（1955-1959）

劉曉鵬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教授

摘要

主流國際關係學者認為，美國在冷戰時期尊重英國在新加坡的殖民地位，故不干涉英國內政，也不介入獨立前新加坡的政治。此外，由於李光耀的反共形象，學者亦少質疑他與美國的友誼；而族群與意識形態接近的台灣，也常被認為與李光耀交好。本文以檔案與國際關係文獻為核心，回顧1950年代李光耀與英國、美國及台灣之間的關係，尋找李光耀不同的面貌。

本文發現李光耀因其行為親北京，使英國與美國產生很大的爭辯，導致美國介入新加坡政治，迥異於主流學者的認知。身為殖民地的英國熟悉新加坡的華人認同政治，認為李光耀是機會主義者、政治變色龍，故可與他合作對抗共產黨。然而美國認為李光耀是地下共產黨，不可合作，更不允其領導新加坡，故支持反共的林有福。台灣的蔣氏父子基於反共而與美國分進合擊，於1959年新加坡大選以鉅資支持林有福，阻擋李光耀當選第一任總理。

本研究解釋李光耀在1959年擔任總理之後和美、台關係仍然不佳，也

進一步發現美國事實上在1959年大選干涉失敗後，才尊重英國對新加坡的政治安排。李光耀直到1965年與馬來西亞分離後，才開始與美、台建立友誼且意識形態明顯疏遠北京。而台灣對李光耀的戒心，因此在1960年代末期開始調整，到1970年代由於雙方合作才逐漸消融。

關鍵詞：李光耀、林有福、機會主義者、蔣經國、蔣介石

* * *

李光耀之名，聞之已久，此次彼來台作私人訪問，彼此見面談話多次，發現其為一非常現實的政客，並無政治理想，不過善於運用各種矛盾，以求自保而已。

——蔣經國日記，1973年5月20日

壹、緒論

冷戰開始後，美國視反共為最重要的任務，考慮到原料與基地的取得已成國家安全問題，故調整其原本的反殖態度，外交政策在精神上與實質上都朝原來的殖民主義國家靠攏，對其最重要的歐洲盟邦—英國—也特別支持（Calvocoressi 2013, 770; Mumford 2017, 20-22）。英國雖然實力大不如前，但仍在全球反殖反帝的浪潮中力圖保留威望。美國瞭解這點，故一般不干涉其殖民地事務，也因此學者常認為美國將新加坡視為「英國的責任」或「大英國協的責任」（British/ Commonwealth Responsibility）（Gould 1969, 220; Chin 1983, 89; Subritzky 2000, 30-31; Jones 2012, 19; Hideki 2018, 156-160; Halvorson 2019, 103-130），尊重倫敦以殖民主的身份安排其前途。

也因新加坡的殖民身份，回顧其對外關係多從1965年獨立起。然而，獨立並非突然達成。1954年倫敦接受林德憲法（Rendel Constitution）之後，新加坡邁向獨立已是趨勢，其領袖也受國際尊重。1955年開始半自治後出現第一位民選領袖，首席部長（Chief Minister，半自治時期的稱呼，1959年全面自治後稱Prime Minister，即總理）是勞工陣線黨籍的大衛馬紹爾（David Marshall，

1908~1995）。馬紹爾1956年剛卸任就訪問中國三個月，即使沒有正式職位，仍獲極佳禮遇，與陳毅及周恩來各會談兩次並發表聯合聲明（Marshall 1996, 26-29）。

全面自治（1959~1963）與結束殖民後的吉隆坡合併時期（1963~1965），新加坡領袖頭銜都是總理，更受尊重。首位總理李光耀在自治與合併時期有許多包括蘇聯與非洲在內的國際出訪，更獲得元首級接待（李光耀 2000, 523-525; 594-607）。因此，新加坡正式獨立前的對外關係就十分豐富，惟探討有限。

在新加坡獨立前對外關係中，有限的資料顯示李光耀與美國的關係並不友好。李光耀在其回憶錄中指出，1959年時美國政府不喜歡人民行動黨（李光耀 2000, 355）。這個回憶應屬正確，因為1959年5月30日立法議會選舉後，李光耀當選自治邦總理，立即批評美國干涉內政，更公開稱讚北京保持中立（The Straits Times, June 2, 1959, 1; Nanyang Siang Pau, June 2, 1959, 5）。美國與李光耀似乎持續不友好，1965年8月新加坡正式獨立後三週，李光耀就在記者會公開批判美國，指1961年中央情報局曾在新加坡活動而迫使國務卿魯斯克（David Dean Rusk, 1909~1994）道歉、1962年過境洛杉磯時美國未適當款待、1965年也未派醫生為他的夫人看病（陳加昌 2016, 131; Chua 2017, 63-69）。¹

學者解釋獨立時新加坡對美國態度不佳，原因在於其試圖爭取不結盟國家的認同，且民間也有反殖反帝情緒，但新加坡被普遍接受為國家後，就改善了對美國的態度（Ang 2010, 26-27; Leifer 2013, 62-63）。蔡偉文則指出，李光耀認為華府在華人與馬來人的族群衝突中偏袒吉隆坡，故直到1966年美國國務助卿William Bundy（1917~2000）當面向李保證中立，雙方關係才回溫（Chua 2014, 442-460）。也有學者認為1966年關係改善，是由於新加坡獨立後的經濟需求（Liu 2020, 567）。Ganesan（2005, 16）認為美新友誼的基礎是

¹ 李光耀夫人生病，欲前往美國醫治，但李光耀擔心其夫人赴美治病造成的政治形象，得罪亞非新興國家，要求美國國務院派特定醫師到新加坡為他的夫人治病。該醫師因故無法前往新加坡，李光耀憤而斥美國無禮。

由於雙方都反共，李光耀本人也支持這樣的說法。李回顧與美國關係時主要也是以1965年後為主，稱其不結盟路線對美國原無好印象，但「美國準備在任何受到威脅的地方，不惜任何代價，同共產黨人對抗到底，這一點倒讓我鬆了一口氣」（李光耀 2000, 525）。

由前述李光耀1959與1965年對美國的批評中可看出，美國之前就與李有互動，因此雙方並不陌生，李光耀毋需等到獨立後再確認美國的反共決心。事實上李光耀可能1950年代中期就對美國在新加坡進行反共行動的決心十分熟悉，因為當時華府擔心英國離開後新加坡遭到共黨滲透，曾試圖阻擋親共的人民行動黨控制新加坡勞工運動（Long 2009, 323-351; Long 2011），而李光耀當時正是勞工運動與人民行動黨的要角。

阻擋人民行動黨就必然會阻擋李光耀，包括與李光耀的對手合作。李光耀回憶錄記載1959年立法議會選舉前，當李正要挑戰總理大位，美國提供金錢支持林有福政府，收錢者是教育部長周瑞麒，金額是70萬美元，他也成功地使對手「因接受美國人的金錢而名譽掃地」。只是更仔細看回憶錄相關插圖，會發現「華僑保險公司總經理」劉攻芸，和「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列為戰爭罪犯的一個惡名昭彰的洋和尚」于斌也有贈款行為（李光耀 2000, 347-355）。這顯示除了美國之外，台灣可能也有介入，因為這兩位受到強烈批判的人士，前者曾任國民政府中央銀行總裁與財政部長，後者是台灣輔仁大學創校校長與樞機主教。

國民政府兩位要員介入選舉顯示台灣可能反對李光耀。然而，不少研究都強調台灣與新加坡的正面友誼，也多認為反共意識形態是台灣與新加坡合作的基礎。杜漢士指出，李光耀和蔣經國的友誼並不令人驚訝，因為李光耀不信任國內左翼，故與反中共的蔣經國發展關係，而李光耀1970年代才結束反中共（Toh 2017, 171）。楊善堯（2019, 70-93）指出台灣政府自蔣介石父子以降皆視李光耀為友人，兩國情誼「超越了…外交關係…是建立於私人情感上的友好互動」。李光耀自己的說法是從1967年開始，從軍事合作逐漸促成1973年的訪問，才建立起與蔣經國的友誼（李光耀 2000, 650），1967年之前則完全沒有記載。石之瑜教授認為1972年美中簽訂聯合公報後，兩個反共政府才開始接近，李光耀也在見到蔣經國後「改變之前對中華文化懷疑的態度」（Shih

2016, 681-701)。

簡言之，許多資料都指出李光耀早年對共產中國有戒心，對台灣代表的中國有好感，而絕大多數的文獻都只注意友善的台新關係，卻忽略李光耀與美國不和時，新加坡與台灣的關係可能的變化。有少量文獻已指出蔣經國控制的國安局，曾派其親信，即掌管外圍單位「國際關係研究會」（後來的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的卜道明赴新加坡考察李光耀，並回報李「親共」與「容共」（佚名 1992, 112-115）。²

受新加坡群眾支持的人民行動黨領袖「親共」與「容共」，那麼台灣一定是被許多新加坡群眾排斥的對象，所以沈錡任職新聞局長期間（1956～1961），委請新加坡反共報人趙世洵，「利用新聞從業人員身份，積極展開活動，盡心竭力扭轉政府形象」（殷月瑾 1992），也自承「送錢給新加坡的首席部長林有福…幫他們競選…卻失敗了」（沈錡 2000, 52），而林有福就是在1959年被李光耀擊敗。李光耀和台灣的關係，在1960年代初似乎也不和諧，如吉隆坡1964年同意台設領事館，就遭到李光耀反對（陳鴻瑜 2011, 123）。此外，蔣介石1975年過世時，李光耀曾出言不敬，指蔣介石「微不足道」、「世界少了他也照樣能生存」（陳加昌 2015, 414-416）。總之，李光耀對台灣的正負面紀錄，顯示台灣與新加坡的友誼，仍有值得探究之處。

美國與台灣皆曾因對抗李光耀而金援林有福政府，與當今部份學者相信的李光耀與華府及台北的友誼有出入，也與「英國責任」的概念不符。在冷戰氣氛下，美台若介入新加坡1959年大選，必然是感受到新加坡即將淪陷於共黨之手，也與部份學者敘述的李光耀反共形象不符。分析早年美新關係的著作有限，而較多的研究已集中在1960年代後，因此本文將焦點集中在1960年之前，即李光耀取得政權之前。

本文將從華人身份認同切入，首先回顧英美對李光耀的不同詮釋，繼而分析林有福協助李光耀清理人民行動黨後，如何影響英、美及台灣介入新加坡政

² 這位佚名發表的人士是早年的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員方雪純。見劉曉鵬，2013，〈敵前養士：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前傳〉，《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82：143, 163。

治的態度。最後說明李光耀1959年成爲總理後，美國與台灣如何與其重建關係。由於新加坡檔案不開放，研究新加坡對外關係一般多使用英國檔案，本文則以美國國家檔案局、總統圖書館、台灣國史館與部份中國外交部檔案爲基礎，透過文獻分析法進一步審視「英國責任」的論述、釐清美台阻擋李光耀成爲新加坡總理的前因後果，以更完整的視角省思冷戰中的敵我關係。

貳、華人身份認同

歷史上新馬一帶的華人常受到中國政局的影響，曾大批參加推翻滿清的革命活動，也積極參加抗日。不過參與者多爲較晚移民的傳統華人，他們受中國文化影響，和早期移民且已受到英殖民文化影響的「海峽華人」（Straits Chinese）有很大不同。海峽華人的中國文化聯繫很弱，關心殖民地前途或英國利益，不過由於跨文化，在身份認同上常可視情況調整（Holden 2009, 8）。

華人身份調整可建構不同的中國性（Chineseness）。該建構並非一成不變，不同地域、歷史或視角會產生不同詮釋。政治上可基於利益，藉調整身份形成新的主體進行溝通（Ang 1994, 75）。王賡武把早年馬來亞華人分爲三類：第一類通常忽略馬來政治，將自己的政治命運與中國連繫。第二類由較爲務實際華人組成，鮮少對政治表態，成員也最多。第三類人數較少，對身份認同不確定（uncertain），對馬來亞政治事務較關心，多不會中文，海峽華人即屬此類。二戰時以「大東亞共榮圈爲號召」的日本，就吸引部份第三類華人與日本合作。戰後也有同類型華人，相信以第一類華人爲主的馬來亞共黨有助民族獨立，因而與之合作。另由於最大的第二類與一、三類界線模糊，海外華人政治上是「騎牆派」（Fence-Sitting）的印象也十分普遍（Wang 1970; Oyen 2010, 64）。

隨著中共崛起成爲冷戰要角，龐大的東南亞華人政治傾向成爲美國關心的焦點。例如美國爲了反共，在教育上協助台灣吸引東南亞華人學生（Li 158-162）。然而新加坡和東南亞其他地方不同，早有傳統華人，特別是前述第一類華人，建立起堅實的教育基礎，毋需台灣協助，甚至有能力和在1950年代建

立第一個海外中文大學—南洋大學—展現對中華文化認知的獨立性。此外，1950年代反殖反帝的潮流中，惟美國是從的台灣對新加坡多數華人也毫無吸引力。美國領事館就以國民黨長期經營的中興日報虧本為證，指台灣的國民黨不受新加坡華人歡迎（Telegram, June 21, 1955）。

國民黨不受歡迎，也對照出共產黨受歡迎。林德憲法開始賦予傳統華人選舉權，實施的背景除了中共崛起，也正值以華人為主的馬來亞共黨積極進行反殖反帝鬥爭，因此中國因素是此時要投入政治圈的新加坡政客們的重要考量。李光耀也就在這股新政治氣氛下參選。

李光耀是海峽華人，身份認同有彈性，其政治認同也視情況調整，在英殖民時期受英國教育，只會馬來文與英文，屬於前述第三類華人。日本占領時期學習日文，成為日軍報道部一員。從英國留學返回新加坡時，先參加右翼的進步黨（Progressive Party），隨著全球反殖潮興起與大批傳統華人參政，他開始轉向左翼。初入政壇時李光耀不會中國話，但那並不是問題，曾與李光耀合作的馬來亞共黨領袖方壯壁指出，當時新加坡的華校青年在殖民主義體系下處於「賤民」地位，能有英語界的菁英來靠攏，無不因敬仰而積極擁護（方壯壁 2007, 138-139）。因此說英語的李光耀，面對許多心向新中國的擁護者，即使文化上有隔閡，但仍能在政治立場上投其所好，故競選時態度上完全朝向北京。

例如韓戰使部份心向祖國的華人信心大增，因此李光耀展現第一類華人期待的中國性：「所有華人都為毛澤東政府的成就感到萬分自豪。一個政府能在幾年內革除貪污腐敗，使它頂得住美國人在朝鮮的武裝力量，這樣的政府是值得大力稱頌的。蔣介石和國民黨完了，只有一些零星的支持者還在談論反攻大陸。」為了擺脫英殖民主義，李光耀爭取第一類華人的支持，無論族群與意識形態都有意無意地向中共看齊，例如他指出「華人為中國感到異常自豪。如果要我在殖民主義和共產主義間作出選擇，我會投票支持共產主義，絕大多數華人也會這麼做」（李光耀 2000, 223; 245）。

李光耀具華人身份且如此支持毛澤東、新中國與共產主義，必然引起美國不快，這也是為何美國總領事Elbridge Durbrow告訴英國的新加坡總督Robert Brown Black，李光耀應是「地下共產黨人」（secret communist），即使不

是，也「和真正的共黨一樣危險」（as dangerous as if he were a member of the Communist Party），因為他被共黨所利用（Telegram, December 23, 1955）。

參、美英對李光耀的不同詮釋

美國總領事向新加坡總督指控李光耀是共黨，顯示在尊重英國的外表下，美國對英國政策的不安。冷戰初起，英美對中國威脅有不同詮釋（Warner 2011）。而東南亞原本就不是美國勢力範圍，即使國力不如以往，需要美國填補權力真空，英國仍盼提供其豐富經驗給美國參考。然而，美國常認為英國在遏止以華人為主體的共黨擴張上，缺乏積極作為（Long 2011, 180）。

一、共黨形象的認知

Elbridge Durbrow反映了當時許多西方學者對東南亞華人親共的懷疑。這種看法是基於海外華人遲早會落葉歸根的假設，因此心向祖國與中共（Purcell 1952; Fitzgerald 1965）。這也是為何覃炳鑫解釋，1950年代的新加坡看來處處共黨，常是根據英文資料論述的結果。即使華人佔人口四分之三，中文文獻卻因為語言障礙而常被西方學者忽略。英文出版品普遍懷疑說中國話的傳統華人，故將許多勞工不滿或反殖運動皆視為共黨陰謀（Thum 2012, 87-109）。

美國外交官的心態符合西方普遍存在的邏輯，認為新加坡華人易為北京的民族主義與族群關係所吸引（Telegram, July 1, 1955）。華人領袖傳統上與殖民政府親近，但在全球反殖潮下，左翼的工運與學運青年已成為新一代華人領袖。新加坡大多數人不一定是左翼，但他們很難抵抗左翼誘惑，即使不親共的報紙都因民眾喜好，而刊登北京的宣傳（Memo, July 19, 1955）。

在當時的政治光譜上，最強大的左翼指的就是1954年崛起，由李光耀與林清祥等領導的人民行動黨。因其支持以華人為主的學運與工運，主要領袖又是華人，在族群與意識形態上皆符合當時許多西方人對共黨的看法，美國領事館因而指出「人民行動黨毫無疑問是共黨前鋒，就算有些領袖不是共黨，也會被共黨控制」（Telegram, July 1, 1955）。那麼誰是共黨？在反共的年代，罕有人自承是共黨，多是潛伏的共黨。在這種環境下，如何認定人民行動黨中的共

黨份子，就十分主觀。

雖然從來沒有證據，當今無論是學術文獻或新加坡官方說法，多指認人民行動黨建黨元老之一的林清祥就是共黨領袖。即使林清祥否認自己是共黨（Telegram, October 7, 1955），就美國而言，林清祥若非共黨，至少是馬克斯主義者（Telegram, September 20, 1955）。這些沒有證據的指控成爲廣爲接受的知識，主要原因就在於林清祥受華人教育，也最能用左翼反殖語言煽動華人群眾，具備西方恐懼的中國共產黨形象。

李光耀和林清祥在成長過程中有明顯文化差異，但是在美國眼中都是華人，也因此這種「共黨同路人」的認定也包括李光耀。李光耀是英文教育出身，參政之初中國話與福建話都極不流暢，因此群眾魅力遠遜林清祥。即使如此，他仍然受到華人社區與青年們的支持。要得到青年華人的支持必然有激進言論，而這些青年支持者也以「共黨式街舞」（communist-type street dances）展現對李的擁戴（Telegram, April 12, 1955）。美國領事館看到李光耀「長期擁護共黨領導的學運」（long has been the champion of communist-led school movement），更加認定他是地下共黨份子（Telegram, May 27, 1955）。

簡言之，和林清祥今天得到的罪名相同，就算李光耀解釋自己相對於說中國話的「共黨」，屬黨內的溫和派，但由於在美國人認知上他的言行仍屬激進，故仍視爲共黨或共黨同路人。

二、機會主義的功能

英國是美國主要盟邦，也是新加坡的殖民主，美國對新加坡的判斷常需與英國協商，而雙方視角不盡相同。面對全球反殖浪潮，實力又有限，爲維持自身地位，如Nicholas Tarling（1998, 152）指出，英國一方面壓制極端主義，另外也積極尋找合作者，展現很大的妥協範圍。英國在東南亞深耕已久，必定瞭解許多華人有政治「騎牆」情形，李光耀就在此背景下成爲英國可以妥協的合作者。

近年有新加坡學者發掘英國檔案，發現倫敦與李光耀私下有合作關係，陳劍更明確指出李光耀雖原本與共黨合作反殖，但在1957年後已和英國組成「統一戰線」（united front）對付共黨（Chin 2008, 63-69）。換言之，雖然美

國視李光耀為共黨，倫敦卻能和李光耀合作。

英國之所以和李光耀合作，關鍵在於他的機會主義性格。1957年之前，英國認為人民行動黨有共黨支持，但對李光耀共黨性的質疑較美國輕。殖民政府向美國領事館解釋，倫敦擔心有共黨傾向的人民行動黨執政，但也說明黨內的領袖不一定是共黨。1953至1957年的布政司長（Colonial Secretary）William A.C. Goode（後於1957至1959任新加坡總督）暗示李光耀受更左的林清祥指揮，公開質疑李親共（Telegram, May 20, 1955）。

但是親共算不算是共黨？連警察的情報部門（Special Branch）的判定也模稜兩可，僅能指出李光耀十分看好未來共黨會獲勝，就其行為上來看，若非共黨，就是親共的機會主義者（opportunist）（Telegram, Sep 28, 1955）。美方向警察總長Nigel Morris求證，也得到類似的答案。Nigel Morris認為李光耀因看好中國共產黨將控制新加坡而親共，雖不是共黨，但無法擺脫共黨控制（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April 7, 1956）。李光耀模糊的政治身份，1955-1957年的新加坡總督Robert Brown Black的意見應有一定的代表性，他認為李不是共黨，而是機會主義者（Telegram, December 23, 1955）。

部份新加坡本地領袖也肯定李光耀是機會主義者的想法。勞工陣線是1955年新加坡首次普選後的執政黨，該黨有清楚的反共政策，也是人民行動黨的主要對手，卻沒有用共產黨來攻擊李光耀。第一任首席部長大衛馬紹爾就告訴美方，李光耀是機會主義者、反殖與民族主義者，但不是共黨（Telegram, March 6, 1956）。

為了解釋李光耀可能不是共黨又看起來像共黨的政治行為，管理華人選民事務的華民政務司兼社團註冊官（Secretary for Chinese Affairs and Registrar of Societies）J.D. Haskins一針見血地指出，李光耀就是「政治變色龍」（political chameleon）（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December 27, 1956）。

在這種機會主義與變色龍的概念下，無論英國官員或親英的勞工陣線，都普遍將李光耀定位為無特定立場的左派，只是藉人民行動黨達到反殖反帝的目的。既然不一定是共黨，就有合作空間，於是英國開始利用李光耀駕馭人民行動黨。美國國務院知道英方企圖，也知道李光耀身邊有一英國特務Alex Josey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February 3, 1956）。³ 英國主要策略是利用李光耀對付其黨內更左的政治對手，即人民行動黨內的「共黨」或激進左翼，削弱人民行動黨的左傾路線。總之，李光耀的變色龍與機會主義者的特色，使其成爲與英國合作的對象。

肆、林有福與李光耀合作的影響

一、清理李光耀黨內政敵

要與李光耀合作，就要確保李光耀在人民行動黨的地位。1955年後英國對新加坡的行政權已多半轉移，故實際削弱行動黨還要靠勞工陣線政府執行。大衛馬紹爾於1956年辭職，繼任首席部長的林有福（1914～1984）希望能成爲1959年全面自治後的第一任總理，因此更積極配合英國反共政策。但勞工陣線既然成爲和英國合作的右派，在反殖潮流下，民意支持度不足，而人民行動黨中，李光耀相對於「共黨」又顯得溫和，故林有福和李光耀合作分裂人民行動黨成爲可能。特別是林有福的手上有警察權，能與李光耀裏應外合。

即使表面上勞工陣線與人民行動黨雙方敵對，但傅樹介查閱英國檔案後指出，在倫敦搓合下，李光耀與林有福已私下合作（Poh 2016, 176-181），美國檔案也證明這點。1957年3月，林有福明確告訴美國官員，他和李光耀關係「相當不錯」（quite cordial），也將會協助李對付行動黨中的「共黨」（Telegram, March 6, 1957），他認爲李光耀已「在他的口袋」（in his pocket）。當時負責與林有福溝通的美國外交官是後來著名的中國通何志立（John Herbert Holdridge, 1924～2001），他向華府報告李林合作關係很快會成真（Telegram, March 28, 1957）。同年5月，林有福再次表示李光耀和他已「充份合作」（cooperating fully），但同時何志立也觀察到林有福可能「過度自信」（cockiness）（Telegram, May 3, 1957）。

到了1957年7月，林有福和李光耀「幾乎每天見面」（meeting almost

³ 據傅樹介考證，Alex Josey隸屬英國軍情六處，二次大戰期間就開始活動，常扮演左派（Poh 2016, 122）。Josey跟隨李光耀多年，於1968年出版全球第一本李光耀傳記。

daily），商討如何協助李光耀發動「清理」（sweep），林李雙方並準備要組新政黨以贏得下次大選（Telegram, July 16, 1957）。8月，人民行動黨內部由「共黨」取得領導權，李光耀的派系辭職，而領導階層立即遭林有福政府以共黨為由逮捕（Ramakrishna 2015, 49-51）。左翼領袖消失，人民行動黨群龍無首，只好請李光耀等人回來，李光耀也順利取得該黨領導權。政壇上自然有傳聞稱李林合作對付自己的同志，李光耀在回憶錄則稱此為「誣蔑」（李光耀 2000, 321）。

何志立在5月間對林有福「過度自信」的批評，逮捕後開始驗證。林有福以為助李光耀奪黨權將獲回饋，結果卻完全相反。由於這次逮捕的多為工人領袖，林有福遭到許多勞工階級的質疑，民衆對李光耀的支持更為鞏固。稱李光耀是「政治變色龍」的J.D. Haskins此時已改任內安局長（Secretary for Internal Security），他告訴美方林有福已無機會，而李光耀有各方支持，除了原有的行動黨群眾，還擴大到受英文教育的年輕人（Telegram, August 29, 1957）。

李光耀也未曾感激林有福。鞏固權力後李光耀指李林合作的傳聞是「胡說」（nonsense），林有福是「替英國人做髒事」（doing the dirty work for the British），他沒有必要還林有福人情（Telegram, September 9, 1958）。此時李光耀與林有福合作的條件，是後者可以把他的人馬帶過來給人民行動黨（Telegram, December 11, 1958）。從李光耀的態度可看出，林有福不但失算，也吃了暗虧。

林有福原本代替倫敦壓制人民行動黨，但現實的英國人發現林有福難以當選新加坡首任總理，寄希望於李光耀的想法就更強烈，也解釋為何陳劍認為1957年後李光耀已和英國人組成統一戰線對付共黨。約自1958年初起，英國分析政情給美方時，已不再懷疑李光耀是共黨，更傾向強調其反共的功能（Telegram, January 21, 1958）。由於李光耀的群眾仍然有不少「共黨」，總督William Goode用「騎虎」（riding the tiger）形容李光耀對行動黨的領導（Telegram, January 24, 1958），雖有讚許其駕馭共黨之意，亦凸顯其難下之處。

倫敦的殖民部官員也開始認為李光耀是真反共，只在面對青年群眾前激進些。他們仍然擔心即使李光耀掌權也不會安然無事，因為李光耀清理不完人

民行動黨內激進左翼，他們仍是黨的主要支柱，可能「在人民行動黨完全控制新加坡事務後，共黨會像特洛伊木馬一樣（搞顛覆）」（do a Trojan horse operation after the PAP is in full control of Singapore affairs）（Telegram, March 12, 1958）。

二、美英爭辯

英國所謂李光耀只是機會主義者，對美國而言不是新聞，因為李光耀對美國向來態度不佳，但黨內鬥爭失利時，對美國領事館的態度就會改善（Telegram, October 9, 1956）。重要的是對美國而言，機會主義就是無法信任，而英方「騎虎」或「特洛伊木馬」等比喻也暗示李光耀不一定有能力完全駕馭行動黨及新加坡，因此美國沒有因為英國的態度就相信李光耀。如Alex Josey替李光耀到美國領事館尋求資金協助，仍遭美方拒絕（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February 3, 1956）。

美英最大的不同在於美國重視李光耀的政治語言，視其為親共證據。李光耀的群眾一心反殖，英國是殖民大國又是美國重要盟友，故群眾往往也視美國為敵。由於當時國際上許多民族主義者，常與親共路線並存，因此也形成美方形塑李光耀的重要因素，認為他會「將民族主義運動轉為在海峽的共產主義運動」，是假民族主義者（Telegram, March 6, 1956）。

為了讓美國更瞭解李光耀，英國鼓勵美方邀請李光耀訪美。因若能成行，人民行動黨的親共性必大幅降低，也會改善美國與李光耀關係。李光耀和美國雙方雖對此事有溝通，但美國擔心無法駕馭李光耀在美國的言行，李光耀也擔心造成政治自殺（political death），終未能成行（Telegram, June 25, 1956）。

林有福協助李光耀除去政治對手後，Alex Josey告知美方，李光耀必將擔任總理，也稱只要林有福和李合作，李會考慮給林有福勞動部長的位子（Telegram, September 9, 1957）。但美國不為所動，仍試圖扭轉政局。即使林有福在1957年12月在十分重要的新加坡市議會選舉大敗，仍堅定支持林有福。⁴ 支持的實際作為就是助選。林有福雖然失去英國的青睞，但與美國關係

⁴ 新加坡當時仍然是市，但該選舉已是1959年升格為自治邦大選的前哨戰。

良好，常與美國領事館分享新加坡政壇資訊，最早在1957年11月就有向美國政府要求10萬美元支持選舉的紀錄（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November 13, 1957）。

美國懷疑李光耀的聲音中，只有駐英使館較瞭解英國政策，也向華府解釋倫敦是以較為現實的手法捍衛自由世界（Telegram, March 12, 1958）。英國身為殖民母國，較瞭解新加坡，盼華府接受英國的設計，接受李光耀當總理。不過，駐新加坡的官員與華盛頓決策圈皆未能聽進去。何志立與總領事都認為應在財務（financial）與道德上支持林有福（Telegram, April 24, 1958），而國務卿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 1888～1959）則代表華府對李光耀的看法。他認為即使林有福聲勢弱，但「人民行動黨若勝選將是自由世界的威脅」（PAP victory would represent danger to Free World），決定支援林有福，除要求駐館與英國官員溝通（Memo, May 15, 1958），美國領館也與李光耀直接溝通。

但溝通結果並不理想。李光耀告訴美方自己能控制人民行動黨與力阻「共黨」，但無法完全掌握結果（Telegram, July 2, 1958）。李自稱反共，但對同樣反共的美方態度不佳，批評美國高傲，稱美國人在新加坡就象徵著右派及殖民主義者。如此使美領館確認李的手法就算看起來反共，由於新加坡青年激進份子太多，使其未來難估，更增加對李光耀狡猾（cunning）和不能信任（untrustworthy）的印象（Telegram, September 2, 1958）。

英國認為李光耀獲勝無法避免，而美國認為還有機會救林有福，雙方對李光耀的共黨性難以妥協。實力強大的美國表面稱尊重英國，實際操作則強詞奪理，以避免傷英美聯盟為由，堅持支持林有福（Memorandum, January 2, 1959）。東亞事務助理國務卿Walter Robertson告訴英國駐美大使Harold Caccia，美國金援林有福乃為了區域穩定，暗示英國縱容李光耀會影響東南亞局勢。英方隨即反駁沒有證據顯示李光耀是共黨，也安撫美方，強調英國仍掌握新加坡，若李光耀掌權後危及英國基地安全，英國仍有權停止憲法進行直接統治，結束新加坡的自治（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March 6, 1959）。

美英對李光耀的態度迥異，雙方在1959年初有不少爭辯。總之，英方基本上認為扶不起阿斗林有福，就應扶植變色龍李光耀，而美國偏反其道而行，英國必然不滿華府干涉其殖民地。巧合的是，雙方爭辯的同時，如前述，身為反

對黨的李光耀忽然得到明確的情報，詳細提供紐約帳戶的證據，指責執政的林有福收取美國人金錢。無論是誰提供資料給李光耀，不但讓林有福徹底失去民心，也讓這場英美對新加坡前途的辯論提前看到結果。

伍、台灣的角色

一、接濟林有福

李光耀指林有福的教育部長周麒瑞1957年收到52萬美金，1958年收到18萬美金（陳加昌 2016, 101-105），李光耀又循線指出劉益之、周瑞麒、劉攻芸、于斌等人經手過紐約的金錢關係，據此把林有福政府打成接受美國金援的反動派。雖然美國檔案中不斷提及要提供金援給林有福，但從未提到台灣。然而，經手的人與國民政府密切相關，表示台灣很可能也介入新加坡選舉。

林有福政府聯合台灣對付人民行動黨，最早的紀錄大約是1957年中，「新聞局駐星聯絡員」趙世洵（即前述沈錡在新加坡安排的反共報人），得知林有福政府需金援，聯絡後於1957年7月，由周瑞麒遣劉益之（亦為趙世洵報業舊識）來台，先與新聞局長沈錡接洽，尋求雙方反共合作，同時要求30萬美金的支持，還特別強調由於美國是白種人國家且與英國關係密切，林有福政府不便向美方索取金援。葉公超表示原則同意金援，不久後林有福政府又寄來8月逮捕人民行動黨中的「共黨」資料（即前述林有福配合李光耀奪權事），證明反共與合作誠意，要求台北支付1萬美元旅費，以安排周瑞麒於9月底密訪。⁵

⁵ 以上資料見〈沈錡呈蔣中正因新加坡教育部長周瑞麒為謀雙方政府合作特派其代表劉益熾來臺轉交其致外交部與新聞局之函件以說明雙方合作途徑並附相關函件及談話紀錄等〉，1957年7月17日（原件誤植為1958年7月17日），於《外交—葉公超周瑞麒等呈蔣中正之函件》，國史館數位典藏號005-010205-00119-010；〈葉公超呈蔣中正因新加坡執政黨勞工陣線主席周瑞麒定於九月來臺現擬依約匯予其一萬美元以示誠意等〉，1957年8月23日，於《外交—葉公超周瑞麒等呈蔣中正之函件》，國史館數位典藏號005-010205-00119-001；〈葉公超呈蔣中正關於星洲虎報及自由報報導有關新加坡政府逮捕共黨顛覆分子一事確係該國執政黨勞工陣線所採之積極行動並附相關剪報〉，1957年8月23日，於《外交—葉公超周瑞麒等呈蔣中正之函件》，國史館數位典藏號005-010205-00119-002；〈葉公超呈蔣中正關於新加坡政府日前發表之政策白皮書及該國首席部長林有福與執政黨勞工陣線主席周瑞麒之言論確係該國當局近來重大之

周瑞麒9月來訪，見到了蔣介石，並於1957年10月底先收到17萬美金。但勞工陣線在12月的市議會選舉中表現極差，台北面臨是否應持續金援的考量。葉公超知道勞工陣線政府和李光耀私下的合作，也知道林有福吃暗虧事。對是否應繼續金援，葉向蔣介石分析：「勞陣領袖缺乏與共匪鬥爭之經驗，對左派人民行動黨看法太過天真，在選舉前與該黨偽裝溫和之領袖李光耀攜手，企圖建立聯合戰線…。但人民行動黨在選舉中佔優勢後，李光耀避不見面，勞陣之聯合計劃失敗，然已噁膈不及。」

葉公超眼中的李光耀是「偽裝溫和」之新加坡版「共匪」，藉「聯合戰線」擊敗林有福，也喚醒國民黨失去中國大陸的教訓。故即使林有福選情低迷，葉公超仍然逆勢操作，評估勞工陣線占執政優勢，只要在1959年全面自治的立法議會獲勝，林有福「尚有可為」，故建議蔣介石「本於患難相助之義」再支付5萬美金助其加強組織。⁶

國內公開檔案有關金援事，大約只到1957年底與1958年初，但其他資料顯示林有福政府1958年仍在台灣積極活動，包括承諾協助台灣與吉隆坡建交，也在12月27日安排馬來亞總理之代表裕末及周瑞麒與蔣介石見面。⁷ 見面

反共措施並附相關剪報等》，1957年8月25日，於《外交—葉公超周瑞麒等呈蔣中正之函件》，國史館數位典藏號005-010205-00119-003；〈星馬雜卷（二）〉，1957-1970年，《外交部》，國史館數位典藏號020-010599-0003。

- ⁶ 以上資料見〈葉公超呈蔣中正因新加坡執政黨勞工陣線主席周瑞麒擬以赴日為名於九月二十八日自港來臺已去電表示歡迎並妥籌接待方法等〉，1957年9月17日，《外交—葉公超周瑞麒等呈蔣中正之函件》，國史館數位典藏號005-010205-00119-004；〈劉攻芸呈蔣中正因新加坡執政黨主席兼教育部部長周瑞麒來臺之目的係為商訂反共合作辦法以為兩國建交之準備請准予其訪華期間前往謁見等〉，1957年9月26日，於《外交—葉公超周瑞麒等呈蔣中正之函件》，國史館數位典藏號005-010205-00119-005；〈葉公超呈蔣中正有關新加坡執政黨勞工陣線於市議會選舉挫敗之分析報告〉，1957年12月23日，於《外交—葉公超周瑞麒等呈蔣中正之函件》，國史館數位典藏號005-010205-00119-007。
- ⁷ 以上資料見〈葉公超呈蔣中正新加坡教育部部長周瑞麒建請臺灣先行協助馬來亞聯邦共和國總理東姑拉曼實施加強巫統改善馬國經濟水準方案俟其順利連任總理後再進行建交事宜〉，1958年6月12日，《外交—葉公超周瑞麒等呈蔣中正之函件》，國史館數位典藏號005-010205-00119-008；〈劉攻芸函葉公超因馬來亞聯邦共和國總理東姑拉曼對於新加坡教育部部長周瑞麒為臺親擬之援巫計畫甚表贊同故與馬來亞建交事應指日可待並附該項援巫計畫等〉，1958年7月5日，《外交—葉公超周瑞麒等呈蔣中正之函件》，國史館數位典藏號005-010205-00119-009；〈黃少谷沈錡呈蔣中正因馬來亞總理

後蔣介石在日記寫下「約見星島與馬來代表予以慰勉」（蔣介石日記，1958年12月28日）。這位馬來代表全名是哈密裕末（Abdul Hamid bin Jumat, 1917-1978），也是新加坡內閣閣員。

蔣介石必定給這兩人重要「慰勉」。三天後即使在新年期間，新加坡成爲蔣經國重要業務。蔣經國寫下「與春丞談接濟新加坡反共力量問題」（蔣經國日記，1959年1月1日）、⁸「約見德美，問其有關新加坡與馬來亞之情況，關於以上二地之政經情形與歷史，知之甚少，擬請人作一專題報告」（蔣經國日記，1959年1月3日）。⁹一個月後新加坡更重要，「約養浩談新加坡之工作問題」（蔣經國日記，1959年2月4日）、¹⁰「派道明赴新加坡從事於反共鬥爭工作」（蔣經國日記，1959年2月14日）。¹¹蔣經國到1959年大選前夕仍十分關心金援林有福，故與「沈錡談接濟新加坡選舉有關問題」（蔣經國日記，1959年5月26日）。

二、誤判情勢

從蔣介石父子重視程度來看，勞工陣線必然收到許多台北的「接濟」，因此新加坡1959年大選揭曉後，蔣介石寫下：「新加坡人民行動黨李光耀此次自治選舉之勝利取得政權，不僅爲亞洲共黨勢力之進一步躍進，遺禍無窮，而且亦爲我個人援助各地反共派失敗之一大教訓。此次援助周林（筆者按：應指周瑞麟與林有福），只知其爲執政黨而不研究爾內容實情是否值得援助與是否收效，只憑葉公超之主觀關係而不察其真偽虛實甚至爲一騙局，可知官僚政客之不知責任與不可再信」（蔣介石日記，1959年6月2日）。

隔日又寫下：「此次星洲計劃失敗之教訓：甲、對金錢消費不需多加考

東姑拉曼之代表裕末及新加坡教育部部長周瑞麒現已抵臺故請准予其等前往謁見），1958年12月27日，《外交—葉公超周瑞麒等呈蔣中正之函件》，國史館數位典藏號005-010205-00119-012。

⁸ 春丞即沈錡，時任新聞局長。

⁹ 德美爲黃德美，時任國安局副局長。

¹⁰ 養浩爲陳大慶，時任國安局長。

¹¹ 道明爲國際關係研究會（屬國安局政策研究室，後改稱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理事長卜道明。

慮。乙、但對人與對事不作正確瞭解與深入考慮則決不可也」（蔣介石日記，1959年6月3日）。新加坡情勢發展持續困擾蔣介石，因此二日後又寫下：「人民行動黨組織政府乃為俄共對亞洲赤化發展第二個陰謀重大成就也」（蔣介石日記，1959年6月5日）。

和他的父親相同，蔣經國也很重視這次失敗，他在李光耀勝選後在日記上寫下：「新加坡選舉中，左傾之人民行動黨已經得勝，吾人所支持之林有福則失敗，此又是一次政治鬥爭之教訓，不過人民行動黨當政，亦決難持久，吾人對新馬問題，仍應密切加以注意」（蔣經國日記，1959年6月1日），而「赴新加坡從事於反共鬥爭工作」的卜道明一週後返國，亦即約見，「談新加坡之情形甚詳」（蔣經國日記，1959年6月8日）。

從資料上看來，雖然1958年之前台北對林有福政府已有支持，但大約到1959年初，才有感於「知之甚少」，開始找人對新加坡的「政經情形與歷史」做專題報告，新加坡成為蔣氏父子的重要工作。蔣經國除不斷的「接濟」林有福政府，也派親信卜道明赴新加坡指揮，可見其對林有福支持之深，後來對選舉結果也難接受，只能咒詛李光耀「決難持久」。

美台干涉新加坡的理由相同，即李光耀和人民行動黨就是共產黨。為了擔心新加坡像中國大陸一樣淪陷，決定慷慨解囊。但蔣介石大筆金錢花下後林有福仍慘敗，不免有些後悔，但又自省不該太在乎錢，只好怪罪葉公超。反共意識形態使總統到外交部長都做錯估形勢。葉公超能向蔣介石報告李光耀及林有福私下合作關係，應該是林有福透過周瑞麒等管道告知，手法和林有福告訴美國領事館的內容相仿。聽者相信林有福的反共決心與李光耀的狡猾，使林有福在1957年12月的市議會選舉大敗後，葉公超和美國官員的反應都和英國人相反，相信勞工陣線政府在1959年的選舉「尚有可為」。

雖然林有福政府用「美國是白種人國家且與英國關係密切」等反殖語言讓台灣相信美國未提供金援，但美台關係密切，這又是華人與中共事務，雙方對援助林有福事，自然會有溝通。劉益之在1957年7月訪台尋求金援時，美方告訴台北，援助事以分頭進行為宜。10月林有福政府收到台北的17萬美金後，如前所述，11月亦向美國索援。美台都是林有福分頭籌集政治資金的對象。

針對美台資金進入新加坡的傳言，陳加昌（2015, 101-112；2016, 112-

119) 認為給林有福政府的鉅款不可能來自當時財政捉襟見肘的台灣。這個看法雖然有誤，但鉅款凸顯蔣介石的反共意志，也解釋蔣在日記上的後悔情緒，更說明直到蔣介石過逝，李光耀仍對蔣出言不敬。

陸、李光耀任總理後

李光耀擔任總理之後，積極與馬來人合作，於1963年合併成為馬來西亞，新加坡正式擺脫殖民身份。之後由於積極參與馬來半島政治，又與馬來人衝突，故新加坡於1965年正式獨立。美國與台灣的懷疑既然沒有發生，又如何調整與李光耀的關係？

一、美國態度的轉變

即使到了立法議會投票前一個月，美國仍懷疑李光耀，認為他的目標是成立「親中國大陸的社會主義馬來亞」（Socialist Malaya oriented towards Mainland China）（Memo, April 9, 1959）。等到林有福的選情已經差到連選後和李光耀談合作的能力都沒有，英國告訴美國，李光耀執政後不會違反英國目前立下的憲法，再支持林有福既危險也無助（dangerous and unproductive）。美國終於承認對新加坡情勢的估算沒有英國人準確（less sanguine），但仍看好人民行動黨內的激進派，認為他們可能會奪權，或逼李光耀離職（Memorandum, May 29, 1959）。

美國對人民行動黨的評估與擔憂，選後不久仍然沒有改變。白宮國家安全會議在1959年8月指出人民行動黨獲勝是美國與自由世界的明顯挫折（distinct setback），對剛開始自治的新加坡並非吉兆（unpromising auspice），仍然認為人民行動黨內各派系將力圖與馬來亞合併，然後「走左翼親中國大陸的路線」（adopt a leftist and pro-mainland China orientation）（Memo, August 12, 1959）。

不過，李光耀已取得政權，考慮新加坡的戰略地位，時間久了美國也必須面對現實調整政策。1959年11月，曾積極反李光耀的杜勒斯國務卿，開始改變口氣。他告訴艾森豪總統（Dwight D. Eisenhower, 1890~1969），李光耀公開

表明不當共產中國擴張的前哨，故新加坡情勢仍有希望。艾森豪則順勢成為政策修正的主要推手。他認為英國仍牢牢控制新加坡，同時也批評白宮國安會的新加坡政策準則。因為這些政策準則中，面對新加坡可能陷入共黨或極左勢力，與英國商量只是裝飾，關鍵內容充滿了「單幹」（independent action）精神，執行手段「甚至包括軍事干涉」（including even military action）。艾森豪認為美國可以單方面介入獨立的東南亞國家，但新加坡是英國的責任區（殖民地），美國不能代英國履行責任，更不應對其提供經濟與技術援助，否則難道連法國責任區也要介入？艾森豪因此要求修改政策準則，未來在新加坡事務上勿再過於主動（Memo, November 5, 1959）。¹²

¹² 艾森豪要求修正以下條文：

Paragraph 67: Encourage and support British, Australian, Federation of Malaya and Singapore Government efforts to strengthen moderate political forces in order to counteract as much as possible the extreme left's pull on the Government. Be prepared, however, after consultation with the British, to take such independent action as necessary to accomplish this end.

Paragraph 68: In case the Communists or the extreme leftists move to gain control of the Government by legal or violent means, consult with the United Kingdom, the Federation, and if appropriate other interested parties, and as necessary support counteraction, being prepared, as necessary, to take independent action along the lines of paragraph 20. (Paragraph 20: In case of an imminent or actual Communist attempt to seize control from within, and assuming some manifest to thwart the attempt, including even military action after appropriate Congressional action)

Paragraph 69: Should overt Communist aggression occur against Singapore, place initial reliance on the resources possessed by Singapore, the British and the Federation of Malaya, but be prepared to take action, if necessary, in accordance with paragraph 19. (Paragraph 19: Should overt Communist aggression occur in the Southeast Asian treaty area, invoke the UN Charter or the SEATO Treaty, or both as applicable, and subject to local request for assistance take necessary military and any other action to assist any Mainland Southeast Asian state or dependent territory in the SEATO area willing to resist Communist resort to force: Provided, that the taking of military action shall be subject to prior submission to and approval by the Congress unless the embassy is deemed by the President to be so great that immediate action is necessary to save a vital interest of the United States.)

Paragraph 69B: Encourage efforts by the Government of Singapore to solve its political and economic problems in ways consistent with US objectives. To the extent feasible, rely on the United Kingdom to provide external financial support to Singapore and, to the extent desired by the United Kingdom, support the utilization of Free World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 in the promo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reforms in Singapore.

美國在新加坡問題上，至此才開始尊重英國的意見。強烈反共的艾森豪政府對於新加坡局勢都努力找台階下，不久後接任的民主黨政府自然更尊重英國與李光耀對新加坡的安排，鮮少再表示意見，即使有衝突也保持低調。1965年新馬分家，獨立後的李光耀考慮到安全與經濟問題，逐漸與美國改善關係，開始強調共黨威脅，也調整了他對北京的態度（Liu 2020, 567）。

二、台灣態度的改變

台灣未如美國在選舉後接受新加坡為英國責任區，對李光耀持續敵視，直到1965年新加坡獨立時，蔣經國仍告訴美國國務院，中共正在利用李光耀，李光耀目前對於自由世界的態度，猶如蘇卡諾（Sukarno, 1901-1970）在一開始的時候一樣（“the Chinese Communists are using Lee Kuan Yew, and his current attitude towards the Free World is just as Sukarno’s was at the beginning”）（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September 22, 1965）。1965年新加坡獨立時，李光耀也對北京承諾「不會同台灣蔣幫建立任何關係」（祁烽自香港電廖承志轉陳毅與周恩來，1965年8月25日）。

新加坡調整對美國與北京的態度，和台灣的關係也開始改變。如李光耀所述，台新關係在1967年逐漸開始建立，因為對獨立的新加坡而言，台灣是合適的軍隊訓練場域。¹³ 蔣經國寫下「審核國防部為新加坡所起草的建立武力計劃，與新加坡之合作對亞洲反共形勢而言，乃為一有利之事」（蔣經國日記，1967年12月8日）。而台灣軍方對形勢的解釋是，李光耀原本「反西方」、「利用與蘇俄關係…保持反美姿態」、「在波蘭曾試圖透過匪使館，要求秘密訪問北平」，但新加坡警察最近沒收「船員所攜之毛語錄」，加上「1967年冬，李氏突赴華府…支持美國在越南之戰爭」、「途中不斷發表談話，支持美國，其與美國之關係亦隨之改善」，「基於以上新加坡外交政策之轉變，並參證李光耀之投機個性」，判斷將循中立路線。「新政府內幕人士透露，新洲與

Be prepared, however, to provide US technic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ssistance when such assistance would be of special significance in achieving US objectives.”

¹³ 新馬不睦且相鄰，雙方一旦有衝突，新軍不免越過國界。新加坡因腹地有限難以訓練，而台灣有類似馬來西亞的環境。

我國之關係，在不觸怒共匪，與我國不在新洲進行反共宣傳的條件下，希望與我有經濟上之關係」（新加坡政黨與外交之研究，1968年6月6日）。

只要不親北京就有合作空間。雙方關係在1969年進一步提升，「中華民國商務代表辦事處」在新加坡設立。失去聯合國席位後（代表權投票中新加坡未支持台灣），能與中立的新加坡交往，對蔣氏父子仍屬珍貴。李光耀1973年來訪，蔣介石十分歡迎，蔣經國寫下「父親囑兒好好招待，並稱其為雪中送炭之人」（蔣經國日記，1973年5月16日）。努力招待之外，蔣經國未忘懷李光耀的善變，仍像十四年前一般，咒詛李垮台：「三天來與李某相處，發覺其為一厲害人物，不過如此而已，此人之政治生命似乎不會太長，非善類之人也」（蔣經國日記，1973年5月18日）。二天後再寫下「李光耀之名，聞之已久，此次彼來台作私人訪問，彼此見面談話多次，發現其為一非常現實的政客，並無政治理想，不過善於運用各種矛盾，以求自保而已」（蔣經國日記，1973年5月20日）。

與李光耀的互動中，蔣經國常淡化兩人關係，如「所談多應酬話」（蔣經國日記，1974年12月27日）、「彼此交情不深」（蔣經國日記，1976年1月25日）。對李光耀仍不時批評，如「李光耀勸泰與匪建交，出人意外，政客以及貪圖小利，莫不如是，亦不作奇」（蔣經國日記，1975年5月10日），指李光耀去電吊喪周恩來，是「國際性的投機行為」（蔣經國日記，1975年1月16日），也形容李「是一個會運用各種因素的政客」（蔣經國日記，1976年1月28日）。

但李光耀海峽華人的彈性身份認同，必然在與台灣交往的各種因素中，發揮一定作用。1950年代李稱「所有華人都為毛澤東政府的成就感到萬分自豪」，拉攏親北京的新加坡選民十分有效，1970年代拉攏台灣時也有類似做法，在台灣展現台北偏好的中國性。蔣經國稱讚他「一再強調自己身為中國人而自傲，共匪正在消滅中國文化，中華民國政府必須保存和發揚中華文化」（蔣經國日記，1976年1月28日）。

李光耀是台灣少有的國際支持，也是國家安全層次，無論蔣經國對李光耀有何意見，「能於此時來訪，表明其反共之立場，實已難能可貴…（東南亞）惟有李光耀尚立得住，所以彼此應加強連繫」（蔣經國日記，1976年1月25

日）。因政治需求而加強的私誼，使蔣經國自述「招待李光耀為期一周。我對其一無所求，以盡交友之道耳」（蔣經國日記，1977年3月19日）多少有些言不由衷。若無所求，為何如此努力招待？

到了台灣失去美國承認時，蔣經國一方面指「李光耀的基本觀念雖然是反共的，但是對共黨的認識還是非常淺薄，可慮」（蔣經國日記，1979年2月21日）。另一方面也給了李最高評價：「李光耀總理此時來台專訪，甚為之感動。國際間尚有如此無所畏懼之友人，稍可安慰矣」（蔣經國日記，1979年2月19日）。1970年代蔣經國對李光耀的批評逐漸緩和、讚美逐漸提高，說明在互利的大環境下，台灣和李光耀過去的對立，很快被新的記憶取代。

柒、結論

李光耀1965年之前都與北京有良好關係，因此若只注意李光耀與中國1966年之後的互動，常只看到衝突，無法完整表達新中關係，也使李光耀具備反共形象（Liu 2020），進而看到新加坡與美台的和諧關係。本文以1959年新加坡大選為核心，強調李光耀與美國及台灣的嚴重對立，試圖透過李光耀不同時期意識形態的變遷，賦予這段友誼更完整的意義。

相較於台灣常流於情緒性的評估，英美對新加坡政治發展的預測較正確。1961年人民行動黨的確爆發嚴重的內鬥。李光耀險勝，人民行動黨也因而分裂，黨內左派另組新黨，成為李光耀政治上最大對手。威脅之大使李光耀在1963年逮捕他們並長期拘禁，至今仍是新加坡重大歷史問題。可見1959年前李光耀強大的「共黨」同志，的確可能在人民行動黨掌權後取而代之。

整體而言，順勢利用機會主義者李光耀造成行動黨內鬥，比起逆勢支持反共的林有福，更能消滅人民行動黨內左翼，確保新加坡留在西方陣營，可看出老練的英殖民帝國壓迫與妥協運用技巧及對華人政治身份的瞭解，高過剛成為西方領袖的美國。美國一心反共，擔心東南亞的圍堵出現漏洞，因此不尊重英國的殖民主地位，支持林有福，防止李光耀執政的手段甚至包括軍事干涉。因此，美國尊重英國的殖民地位的論述，有修正的空間。以李光耀的例子來看，美國是由於扶不起林有福，才開始尊重英國的策略。

蔣氏父子也重金協助林有福，故台灣與李光耀友誼，同樣也有修正空間。蔣經國用蘇卡諾做對比的說法，點出李光耀早年與美台關係不佳的原因，關鍵就在於李是「變色龍」。身為海峽華人，李光耀的政治身份可以調整以符合各方需求的華人性。表面上和「共黨」共同反殖，私下又強調自己和這些傳統華人有別。反殖的同時可以透過Alex Josey與英國合作，更能和右派的林有福合作對付黨內左派對手後翻臉不認，種種因素讓美國無法信任他，自然也讓台灣無法信任他。「機會主義」的負面情緒甚至延伸到蔣經國初見李光耀，但為了國家利益，後來的相互需求掩蓋了雙方衝突的記憶。

（收件：110年8月9日，接受：111年1月11日）

Opportunist: Britain, America, Taiwan and Lee Kuan Yew's Road to Prime Minister, 1955-1959

Philip Hsiaopong Liu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bstract

Since many scholars concur the U.S acceptance of Britain's colonial policies during the Cold War, they therefore rarely study the phenomenon of American intervention in British internal affairs, especially with regard to pre-independence Singapore politics. Moreover, because of popular perceptions of Lee Kuan Yew's anti-communist stance, scholars seldom question his relationship with Washington. Taiwan, due to its ethnic and ideological proximity with Singapore, was also widely believed to be friendly towards Lee. Using archival research, this paper review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ingapore, London, Washington, and Taipei during the 1950s, looking for different images of Lee Kuan Yew.

This paper finds that contrary to mainstream argument, there were serious debates within the Anglo-American sphere over Lee Kuan Yew's pro-Beijing tendencies. The UK, Singapore's then colonial master and therefore was familiar with Chinese identity politics in Singapore, disregarded Lee's words and deeds, believing him to be an opportunist and political chameleon and thus could be relied on as an anti-communist ally. The U.S, believing Lee to be a secret communist however, refused to cooperate with him, strongly opposed his leadership in Singapore, and supported the anti-communist Lim Yew Hock. At the time, Washington's reservations dovetailed with those of Taipei. For the same anti-communist purpose, Chiang Kai-shek and Chiang

Ching-kuo provided substantial funds to support Lim during Singapore's 1959 general election in a bid to block Lee's road toward becoming Singapore Prime Minister.

This study explains Lee's poor relationship with Taiwan and the U.S after he became the prime minister in 1959, and also finds that it was only after the failed U.S attempt to intervene in the 1959 election that Washington began to accept London's plans for Singapore. Moreover, after Singapore's separation from Malaysia in 1965, Lee began to establish a closer friendship with Taiwan and the U.S, and became ideologically much less pro-Beijing. Taiwan's antipathy towards Lee therefore began to change in late 1960s, and gradually vanished due to bilateral cooperation beginning in the 1970s.

Keywords: Lee Kuan Yew, Lim Yew Hock, Opportunist, Chiang Ching-kuo, Chiang Kai-shek

參考文獻

- 方壯璧，2007，《馬共全權代表方壯璧回憶錄》，八打靈再也，雪蘭莪：策略資訊研究中心。Fang Zhuangbi. 2007. *Ma gong quan quan dai biao fang zhuang bi hui yi lu* [Memoir of Fang Zhuangbi, the Representative of Communist Party of Malaya]. Petaling Jaya, Selangor: Strategic Information and Research Development Centre.
- 佚名，1992，〈政要養成所（上）—揭開國關中心的神秘面紗〉，《中外雜誌》，52(4): 112-115。Noname. 1992. “Zhengyao yangcheng suo (shang) - jiekai guoguanzhongxin de shenmi miansha” [Revealing the Secrets of IIR]. *The Kaleidoscope*, 52(4): 112-115.
- 〈祁烽自香港電廖承志轉陳毅與周恩來〉，1965年8月25日，於《關於新加坡離馬來西亞成爲獨立國家及我態度，1965. 8. 10-1965. 8. 24》，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檔案#05-01920-01。“Qifeng zi xianggang dian liaochengzhi zhuan chen yi yu zhouenlai” [Phone Records, Qi Feng to Liao Chengzhi and Transfer to both Chen Yi and Zhou Enlai], August 25, 1965, in *Guanyu xinjiapo likai malaixiya chenwei duli guojia ji wo taidu* [About Singapore Separating from Malaysia to Become an Independent Country and Our Attitude], from August 10, 1965 to August 24, 1965.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Foreign Ministry Archives File Number 05-01920-01.
- 沈錡，2000，《我的一生（二）》，台北：聯經。Shen Qi. 2000. *Wode yisheng (er)* [My Life (2)]. Taipei: Lianjing.
- 〈沈錡呈蔣中正因新加坡教育部部長周瑞麒爲謀雙方政府合作特派其代表劉益熾來臺轉交其致外交部與新聞局之函件以說明雙方合作途徑並附相關函件及談話紀錄等〉，1957年7月17日（原件誤植爲1958年7月17日），於《外交—葉公超周瑞麒等呈蔣中正之函件》，國史館數位典藏號005-010205-00119-010。“Shenqi cheng jiangzhongzheng yin xinjiapo jiaoyubu buzhang zhouruiqi wei mou shuangfang zhengfu hezuo tepai qi daibiao liuyichi lai tai zhuanjiao qi zhi waijiaobu yu xinwenju zhi hanjian yi shuoming

- shuangfang hezuo tujing bing fu xiangguan hanjian ji tanhuajilu deng” [Memo and Files regarding Chew Swee Kee’s representative to Taiwan Discussing Anti-communist Cooperation with Singapore Government, Sheng Qi to Chiang Kaishek,]. July 17, 1957. In *Waijiao—yegongchao zhouruiqi deng cheng jiangzhongzheng zhi hanjian* [Letters to Chiang Kai-shek from George KC Yeh, Chew Swee Kee, etc]. Academia Historica Digital File Number 005-010205-00119-010.
- 李光耀，2000，《李光耀回憶錄 1923-1965》，台北：世界書局。Lee, Kuan Yew. 2000. *liguangyao hui yi lu 1923-1965* [Memoirs of Lee Kuan Yew, 1923-1965]. Taipei: Worldbook.
- 李光耀，2000，《李光耀回憶錄 1965-2000》，台北：世界書局。Lee, Kuan Yew. 2000. *liguangyao hui yi lu 1965-2000* [Memoirs of Lee Kuan Yew, 1965-2000]. Taipei: Worldbook.
- 〈星馬雜卷(二)〉，1957-1970年，《外交部》，國史館數位典藏號020-010599-0003。“Xingma zajuan (er)” [Miscellaneous Affairs in Singapore and Malaya Vol 2]. 1957-1970. In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Academia Historica Digital File Number 020-010599-0003.
- 殷月瑾，1992，〈先夫趙世洵先生小傳〉，《傳記文學》，60(1)：55-56。Yin, Yuejin. 1992. “Xianfu zhaoshixun xiansheng xiaochuan” [A Brief Biography of My Ex-husband Zhao Shixun]. *Biographical Literature*, 60(1): 55-56.
- 陳加昌，2015，《我所知道的李光耀》，新加坡：玲子傳媒。Chen, Jiachang. 2015. *Wo suo zhidao de liguangyao* [The Lee Kuan Yew I knew]. Singapore: Lingzi Media.
- 陳加昌，2016，《超越島國思維：李光耀的建國路與兩岸情》，台北：天下文化。Chen, Jiachang. 2016. *Chaoyue daoguo siwei: liguangyao de jianguo lu yu liangan qing* [Beyond the Thought of an Island Country]. Taipei: Commonwealth Publishing.
- 陳鴻瑜，2011，《新加坡史》，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Chen, Hongyu. 2011.

Xinjiapo shi [History of Singapore]. Taipei: The Commercial Press.

〈新加坡政黨與外交之研究〉，1968年6月6日，陸軍總司令部情報署呈國防部，國軍檔案數位典藏號57_511_6015-2_1_13_00023850。“Xinjiapo zhengdang yu waijiao zhi yanjiu” [Research on Singapore’s Political Parties and Diplomacy]. June 6, 1968. Department of Intelligence, Army Headquarters to Ministry of Defense. Ministry of National Defense Archives Digital File Number 57_511_6015-2_1_13_00023850.

〈黃少谷沈錡呈蔣中正因馬來亞總理東姑拉曼之代表裕末及新加坡教育部部長周瑞麒現已抵臺故請准予其等前往謁見〉，1958年12月27日，《外交—葉公超周瑞麒等呈蔣中正之函件》，國史館數位典藏號005-010205-00119-012。“Huangshaogu shenqi cheng jiangzhongzheng yin malaiya zongli donggulaman zhi daibiao yumo ji xinjiapo jiaoyubu buzhang zhouruiqi xian yi di tai gu qing zhunyu qi deng qianwang yejian” [Memo regarding the Arrival and Visit of Tunku Abdul Rahman’s Representative Abdul Hamid bin Jumat and Chew Swee Kee, Huang Shaogu and Shen Qi to Chiang Kai-shek]. December 27, 1958. In *Waijiao—yegongchao zhouruiqi deng cheng jiangzhongzheng zhi hanjian* [Letters to Chiang Kai-shek from George KC Yeh, Chew Swee Kee, etc]. Academia Historica Digital File Number 005-010205-00119-012.

楊善堯，2019，〈從沈昌煥與李光耀的互動看中華民國與新加坡的關係〉，中國近代史學會編，《老成謀國—紀念沈昌煥先生逝世20週年研討會實錄》：70-93，台北：秀威資訊。Yang, Shanyao. 2019. “Cong shenchanghuan yu liguangyao de hudong kan zhonghuaminguo yu xinjiapo de guanxi” [Reviewing Singapore-Taiwan Relations from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Lee Kuan Yew and Shen Changhuan]. In Association for Modern Chinese History, eds., “*Laocheng mouguo —jinian shenchanghuan xiansheng shishi ershi zhounian yantaohui shilu*” [Conference Minutes for Commemorating Mr Shen Changhuan’s 20th Death Anniversary]. pp. 70-93. Taipei: Showwe Information.

〈葉公超呈蔣中正因新加坡執政黨勞工陣線主席周瑞麒定於九月來臺現擬依約匯予其一萬美元以示誠意等〉，1957年8月23日，於《外交—葉公超周瑞麒等呈蔣中正之函件》，國史館數位典藏號005-010205-00119-001。“Yegongchao cheng jiangzhongzheng yin xinjiapo zhizhengdang laogongzhenxian zhuxi zhouriqi ding yu jiuyue lai tai xian ni yiyue huiyu qi yiwan meiyuan yishi chengyi deng” [Memo regarding Chew Swee Kee’s September Visit to Taiwan and USD 10000 to Chew, George KC Yeh to Chiang Kaishek]. August 23, 1957. In *Waijiao—yegongchao zhouriqi deng cheng jiangzhongzheng zhi hanjian* [Letters to Chiang Kai-shek from George KC Yeh, Chew Swee Kee, etc]. Academia Historica Digital File Number 005-010205-00119-001.

〈葉公超呈蔣中正關於星洲虎報及自由報報導有關新加坡政府逮捕共黨顛覆分子一事確係該國執政黨勞工陣線所採之積極行動並附相關剪報〉，1957年8月23日，於《外交—葉公超周瑞麒等呈蔣中正之函件》，國史館數位典藏號005-010205-00119-002。“Yegongchao cheng jiangzhongzheng guanyu xingzhou hubao ji ziyoubao baodao youguan xinjiapo zhengfu daibu gongdang dianfu fenzi yi shi quexi gaiguo zhizhengdang laogongzhenxian suo cai zhi jijj Xindong bing fu xiangguan jianbao” [Memo regarding Newspaper Clippings Proving Singapore Ruling party’s Anticommunist Endeavor, George KC Yeh to Chiang Kaishek]. August 23, 1957. In *Waijiao—yegongchao zhouriqi deng cheng jiangzhongzheng zhi hanjian* [Letters to Chiang Kai-shek from George KC Yeh, Chew Swee Kee, etc]. Academia Historica Digital File Number 005-010205-00119-002.

〈葉公超呈蔣中正關於新加坡政府日前發表之政策白皮書及該國首席部長林有福與執政黨勞工陣線主席周瑞麒之言論確係該國當局近來重大之反共措施並附相關剪報等〉，1957年8月25日，於《外交—葉公超周瑞麒等呈蔣中正之函件》，國史館數位典藏號005-010205-00119-003。“Yegongchao cheng jiangzhongzheng guanyu xinjiapo zhengfu riqian fabiao zhi zhengce baipishu ji gaiguo shouxibuzhang linyoufu yu zhizhengdang laogongzhenxian

zhuxi zhouruiqi zhi yanlun que xi gaiguo dangju jinlai zhongda zhi fangong cuoshi bing fu xiangguan jianbao deng” [Memo Confirming Lim Yew Hock and Chew Swee Kee’s Anticommunist Attitudes Based on Their Public Statements, George KC Yeh to Chiang Kaishek]. August 25, 1957. In *Waijiao—yegongchao zhouruiqi deng cheng jiangzhongzheng zhi hanjian* [Letters to Chiang Kai-shek from George KC Yeh, Chew Swee Kee, etc]. Academia Historica Digital File Number 005-010205-00119-003.

〈葉公超呈蔣中正因新加坡執政黨勞工陣線主席周瑞麒擬以赴日為名於九月二十八日自港來臺已去電表示歡迎並妥籌接待方法等〉，1957年9月17日，《外交—葉公超周瑞麒等呈蔣中正之函件》，國史館數位典藏號005-010205-00119-004。“Yegongchao cheng jiangzhongzheng yin xinjiapo zhizhengdang laogongzhenxian zhuxi zhouruiqi ni yi fu ri weiming yu jiuyue ershiba ri zi gang lai tai yi qudian biaooshi huanying bing tuo chou jiedai fangfa deng” [Memo regarding Greeting Chew Swee Kee’s Secret Visit on September 28, George KC Yeh to Chiang Kaishek]. September 17, 1957. In *Waijiao—yegongchao zhouruiqi deng cheng jiangzhongzheng zhi hanjian* [Letters to Chiang Kai-shek from George KC Yeh, Chew Swee Kee, etc]. Academia Historica Digital File Number 005-010205-00119-004.

〈葉公超呈蔣中正有關新加坡執政黨勞工陣線於市議會選舉挫敗之分析報告〉，1957年12月23日，於《外交—葉公超周瑞麒等呈蔣中正之函件》，國史館數位典藏號005-010205-00119-007。“Yegongchao cheng jiangzhongzheng youguan xinjiapo zhizhengdang laogongzhenxian yu shiyihui xuanju cuobai zhi fenxi baogao” [Analysis of Labor Front’s Failure in Singapore’s Election, George KC Yeh to Chiang Kaishek]. December 23, 1957. In *Waijiao—yegongchao zhouruiqi deng cheng jiangzhongzheng zhi hanjian* [Letters to Chiang Kai-shek from George KC Yeh, Chew Swee Kee, etc]. Academia Historica Digital File Number 005-010205-00119-007.

〈葉公超呈蔣中正新加坡教育部部長周瑞麒建請臺灣先行協助馬來亞聯邦共和國總理東姑拉曼實施加強巫統改善馬國經濟水準方案俟其順利連任總理後

再進行建交事宜》，1958年6月12日，《外交—葉公超周瑞麒等呈蔣中正之函件》，國史館數位典藏號005-010205-00119-008。“Yegongchao cheng jiangzhongzheng xinjiapo jiaoyubu buzhang zhouruiqi jian qing taiwan xianxin xiezhu malaiya lianbang gongheguo zongli donggulaman shishi jiaqiang wutong gaishan ma guo jingji shuizhun fangan siqi shunli lianren zongli hou zai jinxin jianjiao shiyi” [Memo regarding Chew Swee Kee Suggesting Taiwan help Tunku Abdul Rahman’s Economic Policy in order to Build Diplomatic Relations, George KC Yeh to Chiang Kaishek]. June 12, 1958. In *Waijiao—yegongchao zhouruiqi deng cheng jiangzhongzheng zhi hanjian* [Letters to Chiang Kai-shek from George KC Yeh, Chew Swee Kee, etc]. Academia Historica Digital File Number 005-010205-00119-008.

劉曉鵬，2013，〈敵前養士：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前傳〉，《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82：145-174。Liu, Philip Hsiaopong. 2013. “Di qian yang shi: guojiguanxi yanjiu zhongxin qianchuan” [Assembling Scholars in the Face of the Enemy: The Prequel to th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937-1975].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82:145-174.

〈劉芸呈蔣中正因新加坡執政黨主席兼教育部部長周瑞麒來臺之目的係為商訂反共合作辦法以為兩國建交之準備請准予其訪華期間前往謁見等〉，1957年9月26日，於《外交—葉公超周瑞麒等呈蔣中正之函件》，國史館數位典藏號005-010205-00119-005。“Liugongyun cheng jiangzhongzheng yin xinjiapo zhizhengdang zhuxi jian jiaoyubu buzhang zhouruiqi lai tai zhi mude xi wei shangding fangong hezuo banfa yi wei liangguo jianjiao zhi zhunbei qing zhunyu qi fanghua qijian qianwang yejian deng” [Memo regarding Chew Swee Kee’s Purpose of Visit: Anticommunist and Diplomatic Cooperation, Liu Gongyun to Chiang Kaishek]. September 26, 1957. In *Waijiao—yegongchao zhouruiqi deng cheng jiangzhongzheng zhi hanjian* [Letters to Chiang Kai-shek from George KC Yeh, Chew Swee Kee, etc]. Academia Historica Digital File Number 005-010205-00119-005.

〈劉攻芸函葉公超因馬來亞聯邦共和國總理東姑拉曼對於新加坡教育部部長周瑞麒為臺親擬之援巫計畫甚表贊同故與馬來亞建交事應指日可待並附該項援巫計畫等〉，1958年7月5日，《外交—葉公超周瑞麒等呈蔣中正之函件》，國史館數位典藏號005-010205-00119-009. “Liugongyun han yegongchao yin malaiya lianbang gongheguo zongli donggulaman duiyu xinjiapo jiaoyubu buzhang zhouruiqi wei tai qinni zhi yuan wu jihua shen biao zantong gu yu malaiya jianjiao shi ying zhirikedai bing fu gai xiang yuanwu jihua deng” [Memo regarding Tunku Abdul Rahman’s Satisfaction of Chew Swee Kee’s Plan for Taiwan to Aid Malaya, Liu Gongyun to George KC Yeh]. July 5, 1958. In *Waijiao—yegongchao zhouruiqi deng cheng jiangzhongzheng zhi hanjian* [Letters to Chiang Kai-shek from George KC Yeh, Chew Swee Kee, etc]. Academia Historica Digital File Number 005-010205-00119-009.

蔣介石日記。Jiangjieshi riji [Chiang Kai-shek Diaries], Hoover Institution, Stanford, CA.

蔣經國日記。Jiangjingguo riji [Chiang Ching-kuo Diaries], Hoover Institution, Stanford, CA.

Ang, Cheng Guan. 2010. *Southeast Asia and the Vietnam War*. New York: Routledge.

Ang, Ian. 1994. “The Differential Politics of Chineseness.” *Southeast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22: 72-79.

Calvocoressi, Peter. 2013. *World Politics Since 1945*. New York: Routledge.

Chin, Kin Wah. 1983. *The Defence of Malaysia and Singapore: The Transformation of a Security System 1957–1971*.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hin, Chong Cham. 2008. “The United Front Strategy of the Malayan Communist Party in Singapore, 1950s-1960s.” In Michael Barr and Carl Trocki, eds., *Paths not Taken: Political Pluralism in Post-war Singapore*, pp. 58-77. Singapore: NUS Press.

Chua, Daniel Wei Boon. 2014. “Revisiting Lee Kuan Yew’s 1965-66 Anti-Americanism.” *Asian Studies Review*, 38 (3): 442-460.

- Chua, Daniel Wei Boon. 2017. *US-Singapore Relations, 1965-1975: Strategic Non-alignment in the Cold War*. Singapore: NUS Press.
- Fitzgerald, C.P. 1965. *The Third China: The Chinese Communities in South-East Asia*. Melbourne: F.W. Cheshire.
- Ganesan, Narayanan. 2005. *Realism and Interdependence in Singapore's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Routledge.
- Gould, James. 1969. *The United States and Malaysi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Halvorson, Dan. 2019. *Commonwealth Responsibility and Cold War Solidarity Australia in Asia, 1944-74*. Canberra: ANU Press.
- Hideki, Kan. 2018. "The Making of 'an American Empire' and US Responses to Decolonization in the Early Cold War Years". In Tomohiko Uyama, ed., *Comparing Modern Empires: Imperial Rule and Decolonization in the Changing World Order*, pp. 147-180. Sapporo: Slavic-Eurasian Research Center, Hokkaido University.
- Holden, Philip. 2009. "Literature in English in Singapore before 1965". In Shirley Geok-lin Lim, Philip Holden, Angelia Poon, eds., *Writing Singapore: An Historical Anthology of Singapore Literature*, pp. 5-14. Singapor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Press.
- Jones, Matthew. 2012. *Conflicts and Confrontation in Southeast Asia, 1961-1965: Britain, the United States, Indonesia, and the Creation of Malays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eifer, Michael. 2013. *Singapore's Foreign Policy: Coping with Vulnerability*. New York: Routledge.
- Li, Hongshan. 1998. "The Visible Hand: Washington's Role in US Cultural Relations with Taiwan." In Xiaobing Li and Hongshan Li, eds.,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 New Cold War History*, pp 153-180. Lanham, MA: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 Liu, Philip Hsiaopong. 2020. "Love the Tree, Love the Branch: Beijing's Friendship

- with Lee Kuan Yew, 1954–1965.” *The China Quarterly*, 242: 550-572.
- Long, S. R. Joey. 2009. “Mixed up in Power Politics and the Cold War: The Americans, the ICFTU and Singapore’s Labour Movement, 1955-1960.”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40 (2): 323-351.
- Long, S.R. Joey. 2011. *Safe for Decolonization: The Eisenhower Administration, Britain, and Singapore*. Kent, OH: Kent State University.
- Marshall, David. 1996. *Letter from Mao’s China*. Singapore: Singapore Heritage Society.
- Memo, July 19, 1955, Ralph Clough to McConaughy, “Singapore’s Despatch 615 on Chinese Leadership in Singapore.” In RG 59, Box 3261: 1955-1959 Central Decimal File, # 746F00/6-2155. National Archives, College Park, MA.
-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February 3, 1956, Sir Robert Scott, “Commissioner General for the UK in SEA and Elbridge Durbrow, American Consul General.” In RG 59, Box 3261: 1955-1959 Central Decimal File, # 746F00/10-2256. National Archives, College Park, MA.
-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April 7, 1956, American Consul General Elbridge Durbrow and Governor of Singapore Sir Robert Black. In RG 59, Box 3261: 1955-1959 Central Decimal File, # 746F00/4-756. National Archives, College Park, MA.
-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December 27, 1956, J. H. Holdridge, “American Consul and J.D. Haskins, Secretary for Chinese Affairs and Registrar of Societies.” In RG 59, Box 3261: 1955-1959 Central Decimal File, # 746F00/12-2756. National Archives, College Park, MA.
-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November 13, 1957, US State Department, “Possible Assistance to Lim Yew Hock.” In RG 59, Box 3262: 1955-1959 Central Decimal File, # 746F00/11-1357. National Archives, College Park, MA.
- Memo, May 15, 1958, “US State Department to American Consulate General in Singapore.” In RG 59, Box 3263: 1955-1959 Central Decimal File, # 746F00/5-1558. National Archives, College Park, MA.

- Memorandum, January 2, 1959, US State Department, "Deterioration of Political Situation in Singapore." In RG 59, Box 3263: 1955-1959 Central Decimal File, # 746F00/9-259. National Archives, College Park, MA.
-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March 6, 1959, Walter Robertson,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and Harold Caccia, British Ambassador to the US." In RG 59, Box 3263: 1955-1959 Central Decimal File, # 746F00/3-659. National Archives, College Park, MA.
- Memo, April 9, 1959, US State Department, "Current Political Situation in Singapore." In RG 59, Box 3263: 1955-1959 Central Decimal File, # 746F00/4-959. National Archives, College Park, MA.
- Memo, May 29, 1959, US State Department, "Singapore Political Situation on Eve of Election." In RG 59, Box 3263: 1955-1959 Central Decimal File, # 746F00/5-2959. National Archives, College Park, MA.
-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September 22, 1965, Chinese Defense Minister Chiang Ching-kuo, Chinese Ambassador Chow Shu-kai, Chinese Government Information Office Director James Shen, INR Director Thomas Hughes, INR/RFE Allen Whiting, and EA/ROC Officer Norman Getsinger. In RG 59, Box 2652: 1964-1966 Central Foreign Policy Files, # POL16SING. National Archives, College Park, MA.
- Memo, August 12, 1959,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Operations Coordinating Board Report on US Policy in Mainland Southeast Asia." (NSC 5809) In Box 55: Disaster Fil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taff Paper 1948-1961. (Dwight Eisenhower Library, Abilene, KS)
- Memo, November 5, 1959, "Discussion at the 423rd NSC Meeting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In Box 11: Ann Whitman File, Eisenhower, Dwight D: Papers as President, 1953-1961. (Dwight Eisenhower Library, Abilene, KS)
- Mumford, Andrew. 2017. *Counterinsurgency Wars and the Anglo-American Alliance: The Special Relationship on the Rocks*. Washington DC: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 Nanyang Siang Pau*. Singapore Newspaper Archives. <https://eresources.nlb.gov.sg/newspapers/> (Accessed on August 1, 2021).
- Oyen, Meredith, 2010, “Communism, Containment and the Chinese Overseas.” In Zheng Yangwen, Hong Liu and Michael Szonyi, eds., *The Cold War in Asia*, pp. 59-94. Boston: Leiden.
- Poh, Soo Kai. 2016. *Living in a Time of Deception*. Petaling Jaya: Strategic Information and Research Development Centre.
- Purcell, Victor. 1952. *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Ramakrishna, Kumar. 2015. *Original Sin? Revising the Revisionist Critique of the 1963 Operation Coldstore in Singapore*.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 Shih, Chih-Yu. 2016. “Affirmative Balance of the Singapore-Taiwan Relationship: A Bilateral Perspective on the Relational Tur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18(4): 681-701.
- The Straits Times*. Singapore Newspaper Archives. <https://eresources.nlb.gov.sg/newspapers/> (Accessed on August 1, 2021).
- Subritzky, John. 2000. *Confronting Sukarno: British, American, 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 Diplomacy in the Malaysian-Indonesian Confrontation, 1961-65*.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 Tarling, Nicholas. 1998. *Britain, Southeast Asia, and the Onset of the Cold War, 1945-195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elegram, April 12, 1955, American Consulate General to US State Department, “An Interim Political Appraisal of the Singapore Election.” In RG 59, Box 3261: 1955-1959 Central Decimal File, # 746F00/4-1255. National Archives, College Park, MA.
- Telegram, May 20, 1955, American Consulate General to US State Department, “Singapore Riots of May 12-13, 1955.” In RG 59, Box 3261: 1955-1959 Central Decimal File, # 746F00/5-2055. National Archives, College Park, MA.

Telegram, May 27, 1955, American Consulate General to US State Department, “Singapore Riots of May 12-13, 1955: A Political Appraisal.” In RG 59, Box 3261: 1955-1959 Central Decimal File, # 746F00/5-2755. National Archives, College Park, MA.

Telegram, June 21, 1955, from US Consulate in Singapore to US State Department, “Chinese Leadership in Singapore.” In RG 59, Box 3261: 1955-1959 Central Decimal File, # 746F00/6-2155. National Archives, College Park, MA.

Telegram, July 1, 1955, American Consulate General to US State Department, “Political and Economic Assessment Situation Singapore.” In RG 59, Box 3261: 1955-1959 Central Decimal File, # 746F00/7-155. National Archives, College Park, MA.

Telegram, September 20, 1955, American Consulate General to US State Department, “The Political Climate in Singapore.” In RG 59, Box 3261: 1955-1959 Central Decimal File, # 746F00/9-2055. National Archives, College Park, MA.

Telegram, Sep 28, 1955, American Consulate General to US State Department, “Comments of John Higham, Director of Personnel, Government of Singapore, on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RG 59, Box 3261: 1955-1959 Central Decimal File, # 746F00/5-2855. National Archives, College Park, MA.

Telegram, October 7, 1955, American Consulate General to US State Department. In RG 59, Box 3263: 1955-1959 Central Decimal File, # 746F00/10-755. National Archives, College Park, MA.

Telegram, December 23, 1955, American Consul General Elbridge Durbrow to US State Department, “Transmitting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with the Governor of Singapore.” In RG 59, Box 3261: 1955-1959 Central Decimal File, # 746F00/I-355. National Archives, College Park, MA.

Telegram, March 6, 1956, American Consulate General to US State Department, “The General Political Situation in Singapore.” In RG 59, Box 3261: 1955-1959 Central Decimal File, # 746F00/3-656. National Archives, College Park,

MA.

Telegram, June 25, 1956, American Consulate General to US State Department,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with Lee Kuan Yew.” In RG 59, Box 3261: 1955-1959 Central Decimal File, # 746F00/6-2556. National Archives, College Park, MA.

Telegram, October 9, 1956, American Consulate General to US State Department,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Lee Kuan Yew.” In RG 59, Box 3261: 1955-1959 Central Decimal File, # 746F00/10-956. National Archives, College Park, MA.

Telegram, March 6, 1957, American Consulate General to US State Department, “Singapore Chief Minister’s Comments on Political Developments.” In RG 59, Box 3262: 1955-1959 Central Decimal File, # 746F00/3-657. National Archives, College Park, MA.

Telegram, March 28, 1957, American Consulate General to US State Department, “Background on Current Development in Singapore.” In RG 59, Box 3262: 1955-1959 Central Decimal File, # 746F00/3-2857. National Archives, College Park, MA.

Telegram, May 3, 1957, American Consulate General to US State Department, “Evolution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s in Singapore.” In RG 59, Box 3262: 1955-1959 Central Decimal File, # 746F00/5-357. National Archives, College Park, MA.

Telegram, July 16, 1957, American Consulate General to US State Department, “Singapore Chief Minister’s Comments on Political Conditions.” In RG 59, Box 3262: 1955-1959 Central Decimal File, # 746F00/7-1657. National Archives, College Park, MA.

Telegram, August 29, 1957, American Consulate General to US State Department, “Comments on Singapore Government’s New Anti-Subversion Sweep by Chief Minister.” In RG 59, Box 3262: 1955-1959 Central Decimal File, # 746F00/8-2957. National Archives, College Park, MA.

Telegram, September 9, 1957, American Consulate General to US State Department,

“Inside the PAP.” In RG 59, Box 3262: 1955-1959 Central Decimal File, # 746F00/9-957. National Archives, College Park, MA.

Telegram, January 21, 1958, American Consulate General to US State Department, “Colonial Office Reaction to Singapore Municipal Election.” In RG 59, Box 3262: 1955-1959 Central Decimal File, # 746F00/1-2158. National Archives, College Park, MA.

Telegram, January 24, 1958, American Consulate General to US State Department, “Remarks by the Governor of Singapore Regarding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in Singapore.” In RG 59, Box 3262: 1955-1959 Central Decimal File, # 746F00/1-2458. National Archives, College Park, MA.

Telegram, March 12, 1958, American Embassy, London to US State Department, “Colonial Office Views on the Developing Singapore Situation.” In RG 59, Box 3262: 1955-1959 Central Decimal File, # 746F00/3-1258. National Archives, College Park, MA.

Telegram, April 24, 1958, American Consulate General to US State Department, “Political Situation in Singapore.” In RG 59, Box 3262: 1955-1959 Central Decimal File, # 746F00/4-2658. National Archives, College Park, MA.

Telegram, July 2, 1958, American Consulate General to US State Department, “Conversation with Lee Kuan Yew.” In RG 59, Box 3263: 1955-1959 Central Decimal File, # 746F00/7-258. National Archives, College Park, MA.

Telegram, September 2, 1958, American Consulate General to US State Department, “Remarks by Lee Kuan Yew on Singapore Political Situation.” In RG 59, Box 3263: 1955-1959 Central Decimal File, # 746F00/9-258. National Archives, College Park, MA.

Telegram, September 9, 1958, American Consulate General to US State Department, “Remarks by Lee Kuan Yew on Singapore Political Situation.” In RG 59, Box 3263: 1955-1959 Central Decimal File, # 746F00/9-258. National Archives, College Park, MA.

Telegram, December 11, 1958, American Consulate General to US State

Department, “British Colonial Office Working Level Views on Situation in Singapore.” In RG 59, Box 3263: 1955-1959 Central Decimal File, # 746F00/9-1158. National Archives, College Park, MA.

Thum, Ping Tjin. 2012. “The Limitations of Monolingual History.” In Nicholas Tarling, ed., *Studying Singapore’s Past: C.M. Turnbull and the History of Modern Singapore*, pp. 87-109. Singapor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Toh, Han Shih. 2017. *Is China an Empire?*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Wang, Gunwu. 1970. “Chinese Politics in Malaya.” *The China Quarterly*, 43: 1-30.

Warner, Geoffrey. 2011. “Anglo–American Relations and the Cold War in 1950.” *Diplomacy & Statecraft*, 22(1): 44-60.

